

• 动态 •

《阿拉伯国家动乱中的军政关系因素》译介

德里克·卢特贝科/文

袁亚楠/编译

【摘 要】本文选自《武装力量与社会》2013 年 1 月号,作者系马耳他大学地中海外交研究院德里克·卢特贝科。该文指出,自 2010 年下半年以来,一场规模空前的、要求更大政治自由的抗议运动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导致一些国家政权更迭。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长期执政的领导人被罢黜,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也面临着迅猛发展的反对派运动,那些看似坚如磐石的政权也摇摇欲坠。该文旨在考察武装力量在这些民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该文指出,虽然武装力量在阿拉伯动乱中举足轻重,其对民主运动的反应却迥然不同,有的接受抗议运动,有的本身内部分裂,有的则坚决维护执政当局。该文认为,这些差异可能是不同的军政关系和不同类型的军事体制造成的。武装力量制度化的程度以及其与整个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导致其对改革运动的反应各异。

【关 键 词】《阿拉伯国家动乱中的军政关系因素》译介

【译者简介】袁亚楠(1955 ~) ,女,上海市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治工作系外军政治性工作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外军政治性工作。

概 要

该文分析了几个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军政关系,指出武装力量在目前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自 2010 年下半年以来,一场规模空前、要求拥有更大的政治自由的抗议运动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导致一些国家政权更迭。2011 年 1 月,突尼斯的本·阿里被推翻,随后,埃及抗议运动的势头大增,在 3 周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后,执政长达近 30 年的霍斯尼·穆巴拉克总统下台了。2011 年中,轮到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在与反对派打了 6 个月的内战后,他被罢黜,随后又死于非命。在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中,反对派运动愈演愈烈,反对派要求更多政治自由,要求执政者下台,看似大权在握的执政者们似乎也摇摇欲坠。

本文旨在研究武装力量在阿拉伯骚乱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分析家把强大的军队和健全的安全机构视为中东和北非地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障碍(即便不是主要的),然而,该地区的军队对民主运动的反应截然不同,有的接受甚至支持抗议运动,有的自己本身内部分裂,有的则坚决维护执政当局。本文认为,不同的军政关系和不同类型的军事体制可以解释这些差异的产生。尤其是武装力量制度化的程度及其与整个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导致其对改革运动的反应各异。

我们首先讨论中东和北非地区军政关系的性质和现有相关文献资料,然后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巴林四个国家进行案例分析,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民主运动和反政府抗议活动,但其武装力量对民众骚乱的反应各不相同。在这四个案例中,武装力量制度化的程度及其与民众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以解释它们对反政府运动的反应。我们认为,武装力量的制度化程度越高,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越密切,它就越能接受民众骚乱。

本文并不关注当前动荡中阿拉伯国家全部军事力量的行动,重点限于这些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要素,即武装力量,尽管这些力量与其他安全部队之间的区别不一定清晰可见。这并不是说其他安全机构,例如警察和其他国内治安部队或情报机构在对付(尤其是镇压)这些阿拉伯国家里的民众骚乱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军队无疑是这一事件的主角之一,因此值得单独分析其在阿拉伯骚乱中所起的作用。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军政关系

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人们热衷于研究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军政关系,但是随后的几年里,这一问题逐渐受到冷落。早期研究一般突出武装力量在大多数中东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已由频繁的军事政变和各种军事干预政治的事件所证实,

同时这些研究还强调军队常常是这些国家政权的支柱和终极权力的基础。亚莫斯·波尔穆特根据埃及的情况专门创造了一个术语:禁卫军政权。禁卫军政权是指一个“军队常常干预政府,并有能力去掌控政府”的政权。禁卫军政权的政治领导层主要来自军队,或来自与军队关系密切的组织,而且军队在所有的重要政治机构里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波尔穆特进一步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禁卫军政权的军队:“军人仲裁者”和“军人统治者”。“军人仲裁者”试图限制军事统治并设法从幕后影响政治,而“军人统治者”则长期直接实施军事统治。

即使现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被称为“军人执政”政权,即武装力量直接并公开参与日常政务,但在诸多国家中,军方继续从幕后监督政治进程。用波尔穆特的话来说,这些国家可能是“军人仲裁者”国家。事实上,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武装力量在国内政治方面担当最重要角色的区域。虽然如今更加平民化的政府(即使其首脑通常是前军队领导人)做出大多数决策,但是军队仍然是政治体系中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发生危机时,或者军队认为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军队很有可能一把揽过大权,直接控制政治决策。

这种一般性描述适用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而最近迈赫兰·卡姆拉瓦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军政关系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按照不同的军政关系,他把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分为三种类型:“军人政治家独裁”政权、“酋长君主制”政权和有着“双重军队”的政权。第一种政权通常由前军人统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成为平民政治家,整个国家机器也基本平民化,尤其是统治者本人也提防军队掌握政治权力。然而,尽管军方不再直接参与政治,但它仍然在幕后,经常通过更多的非正式渠道,起着重要的作用。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等国家就是军人政治家独裁政权的实例。实际上,所有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完全控制总统任免权,因此,军队仍然是终极权力的基础。

军政关系的另一种形式可见于阿拉伯世界的酋长君主国,如波斯湾的石油君主国,或者摩洛哥和约旦。这些国家的显著特点是非常依赖对政权忠心耿耿的部落军队,或外国雇佣军。波斯湾的小国家,例如巴林、阿曼或卡塔尔,由于国土很小,无法驻扎庞大军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雇佣军。较大的君主国,如沙特阿拉伯或摩洛哥,常常用部落的忠诚来遏制正规军的影响。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国民警卫队主要来自特别忠于王室的部落,其主要任务是抵消正规军的影响,保护政权对抗内部的敌对势力。

双重(甚至多重)军队很少(或不仅仅)基于部落的忠诚,而是基于意识形态。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如伊朗、伊拉克(2003年之前),或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也有这样的军队。除了常规军队,这些国家已经创建类似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政权,对抗国内的威胁,其中包括正规军的挑战。他们通常是志愿兵,具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并对领袖或政权有着情感依恋。例如,伊朗革命卫队就把自己视为1979年革命的主要卫士。

处于这些不同类型的军政关系之中,武装力量会对反政权的抗议运动做出怎样的反应?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考虑一下伊娃·贝琳提出的一个论点。她认为,军队“制度化”的程度是决定其对改革运动反应的关键因素。“军队制度化程度越高,它就越愿意脱离政权,允许实施政治改革。它的制度化程度越低,它就越抵制改革。”武装力量有一套明确的规章制度,建立了职业发展途径,而且军官的提拔取决于他们的表现,而不是取决于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忠诚。此外,军队要公私分明,以便抵制腐败和安全部队对社会的掠夺行为。如果军队是基于这样的原则,那么它履行职责是为了整个国家利益,而不是个别军事领导人或某些派系的私利。上述所提到的制度化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武装力量(相对来说)有别于政权。

贝琳分析说,与制度化相悖的是世袭制,世袭制意味着武装力量政治上偏袒和任人唯亲。指挥官的提拔基于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忠诚,而不是军事或其他专业能力。军队公私不分,腐败堕落。世袭制的军队更可能反对政治改革和政权更迭,因为改革会使它们失去更多。相比之下,上述所提到的制度化军队往往对改革和政治变革更加宽容,因为它们不依附政治领导层,是一个合法的机构。如果军队高度制度化,它们可以期望在政权变更后继续存在,甚至保持它们原有的地位。

可以说,部落控制的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军队的制度化程度很低,而且不乐意接受政治改革甚至政权更迭。这类军队主要基于对政权和自己领袖的宗族上的或意识形态上的忠诚,而不是基于专业能力和其他任人唯才的原则。由于几乎没有合法地位,甚至其存在只是为了它们为之效力的领袖,所以它们可能会反对改革运动。在军人政治家独裁政权的情况下,军队制度化的程度,以及军队对政治改革的接受程度,可能各国彼此不同。尽管一般认为,与部落控制的或意识形态控制的军队相比,军人政治家独裁政权统领下的军队制度化程度往往要高一些,然而由于世袭制的特点,如任人唯亲或腐败是普遍现象,或者普遍存在军队政治化的其他现象,其制度化的程度以及对改革接受的程度可能还是很低的。

鉴于制度化或世袭制的程度或多或少解释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武装力量对改革运动所做出的反应,有人认为至少还需要考虑被贝琳分析时遗漏的一个因素,即军队与广大民众的关系。如果军队与社会关系密切,那么军队就不太可能用武力来对付受到社会上大部分人支持的抗议运动。而那些非常依赖外国雇佣兵的国家(如波斯湾的小君主国),或者其军队主要来自某些亲近政权的部落的国家,很少会阻止军队用武力对付民众骚乱。

确保武装力量与社会关系密切的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广泛征兵。与受某些(少数)部落控制的军队,或非常依赖外国雇佣兵的军队相比,兵役制的军队会在对民众使用武力时更加犹豫不决,从而也更容易接受改革运动。

如前所述,军队的制度化程度越高,与民众的关系越密切,就越能接受民众的改革运动或反政府运动。反之,如果军队的制度化程度很低,与民众的关系疏远,就会倾向于反对并镇压改革运动。

突尼斯武装力量:接受改革运动

尽管在本·阿里政权被推翻之前,突尼斯可能被称为军人政治家独裁政权,武装力量在突尼斯的作用和地位在阿拉伯地区一直非常独特。可以说,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会比突尼斯军队更加远离政权。独立时,突尼斯军队所起的作用就不同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许多阿拉伯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任领导人往往是军人,军队常常是独立后政权的支柱。然而突尼斯的第一任领导人哈比卜·布尔吉巴是位律师,而且他不认可军队的政治作用。作为一名法国崇拜者,他试图用法国共和制来改造突尼斯,实行军政分离。

布尔吉巴的继任者本·阿里尽管拥有上将军衔,并通过发动不流血政变掌权,但他来自情报机构而不是正规军。一旦执政,本·阿里同样尽可能地限制军队的政治影响。虽然突尼斯军队已经在国内事务中起着某种作用,并多次平息国内动乱,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突尼斯军队实施改革,已脱离政界,完全职业化。政府力图尽可能让军队远离政治,例如禁止军人参政,清除被疑有政治野心的军官等。在减少军队的政治作用的同时,加强军人的专业技术知识。结果,突尼斯军队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一支具有高度职业化的、无党派的武装力量,与本·阿里政权本身相比,军队并不那么腐败和任人唯亲。在突尼斯,术语 *la grande muette*(广大的沉默者)通常用来形容军队,凸显其在公共事务中的谨慎和不干涉态度。

鉴于突尼斯政府一直让军队远离政权,本·阿里依靠国内安全和情报机构作为其权力基础和压制内部异议的工具。政府对国内安全(和情报)机构的重视要胜过对军队的重视,这也体现在人数上:突尼斯军队共计35000人,而该国据估计有130000~150000名警察。迄今为止,突尼斯军队还是北非人数最少的武装力量。即使利比亚的人口不及突尼斯的一半,其军队的人数也超过突尼斯军队的两倍。同样,突尼斯的国防开支也很少,总计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远远低于其他阿拉伯国家。

2010年12月,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自己的货车被警察没收后自焚,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改革运动,突尼斯军队从一开始就接受,甚至支持这场运动。抗议活动迅速从事件发生地的突尼斯中部城镇蔓延到其他城市,其中包括首都突尼斯,同时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不仅呼吁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消灭腐败,而且还要求本·阿里下台。2011年1月,军队奉命镇压愈演愈烈的示威行动。据媒体报道,军队进驻突尼斯各地,立刻与游行示威者友善交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时警察已经枪杀了许多抗议者。军队的行为当然也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突尼斯军队是一支兵役制的武装力量,大多数应征入伍的士兵来自经济落后的地区,很有可能与示威者一样对政府怀有不满。此外,据报道,陆军参谋长拉希德·阿马尔禁止部下向示威者开枪,并向警方发出警告说,如果警察继续枪杀抗议者,军队将予以回击。在突尼斯街头,据说许多示威者躲在军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后面,以免被警察击中。因此,本·阿里对军队的行为非常不满,据传他试图以阿马尔将军不服从命令而解除他的职务。

突尼斯武装力量和其领导层不仅避免对抗议者使用武力,而且最终促使本·阿里远走他乡。据与突尼斯前总统及前国防部部长关系密切的知情人士透露,在本·阿里执政的最后几天,军队和政权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由于本·阿里总统卫队镇压示威者,军方领导人大大为恼怒。最后,1月14日,正是阿马尔将军本人逼迫本·阿里离开这个国家,他亲自告诉本·阿里,他完蛋了。

在突尼斯,军队高度制度化,而且广泛征兵使军队与整个社会关系密切,这使军队完全接受改革运动。军队从一开始就支持抗议者反对政权,甚至似乎最终促使阿里垮台。

埃及武装力量:对改革运动犹豫不决

埃及军政关系与突尼斯军政关系的不同可以用来解释埃及武装力量对反政府暴乱的不同反应。跟突尼斯类似,埃及武装力量可谓一支专业的精英统治的军队,这是职业化的

重要因素,尽管近年来任人唯亲和徇私枉法的现象似乎已经比比皆是,这也令军人愤愤不满。在埃及,军队享有很高的声誉。民意调查显示,军队是该国最受人尊重的组织,也许被视作唯一一个真正为国家利益效力的机构。然而,与突尼斯军队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自从 1953 年“自由军官”废除君主制以来,埃及武装力量一直担当着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并与政权保持密切关系。

在推翻君主制后的数十年里,埃及武装力量直接控制着大部分的政治决策。在 1967 年的战争失败后,安瓦尔·萨达特和他的继任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努力限制军队的政治影响,调整军队的作用,使它只履行军事职责。然而,军队尽管退出了日常政务,仍然是埃及政治体系的关键支柱。军方至少迄今为止一直掌握着总统的职位——自从军队推翻君主制以来,所有的埃及总统实际上都来自军官团。

此外,虽然武装力量对政治决策的直接影响有所降低,但已经成为埃及经济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政治上让步的交易。这与突尼斯的情况显然不同。从武器制造(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开始,埃及军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扩展到其他诸多重要的产业和企业,从电子、日用消费品、基础设施建设到旅游业都有涉及。尽管军队企业的规模没有得到官方数据的证实,但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40%,或许军队已成为该国最大的企业。除了这些内部的收入,埃及武装力量一直是美国军事援助的主要对象之一,每年平均接受 13 亿美元。

虽然埃及军队经商的正式理由是减轻国家预算的负担并且造福社会,但这也使他们不用对任何当局负责,也完全逃避了公众监督。对于个别军官来说,这些庞大的军队企业(和大量外国援助)不仅提供了利润丰厚的收入,而且使腐败有机可乘。

与突尼斯武装力量相比,埃及武装力量的世袭制程度更高,特别是就其商业活动而言,它与政权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它不太能接受 2011 年 1 月在埃及迅猛发展的抗议运动。与突尼斯的情况相同,埃及的抗议活动从呼吁政治和经济改革,发展到要求推翻穆巴拉克政权。2011 年 1 月下旬,埃及军队被部署到全国各地对付大规模示威活动,与突尼斯军队一样,他们也声称抗议者的要求是“合法的”,并承诺“不使用武力反对埃及人民”。尽管由于最初不知道军队如何对待示威运动,所以有几辆军车被抗议者焚烧,但士兵们普遍受到示威者的欢迎。就像在突尼斯那样,士兵和抗议者之间关系友善,一些军官甚至加入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活动。在埃及,军队也是兵役制的,士兵来自中低阶层,这有助于军队认同抗议者的要求。

然而,与突尼斯武装力量相比,埃及武装力量总的来说不是那么坚决地支持抗议者,

更多的是维护政权。国际危机小组总结了埃及武装力量在骚乱中所起的作用“在整个抗议活动中,军队始终摇摆不定,态度模棱两可,据称站在人民一边,同时又是他们与之对峙的政权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总之,相比之下,埃及武装力量对改革运动的态度更加模棱两可。尽管埃及军方最终支持抗议者反对总统,似乎在穆巴拉克被罢黜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通常不愿态度鲜明地支持抗议者,同时又显得自己远离国家首脑。因为埃及军队的制度化程度不高,而且与突尼斯军队相比,它与埃及政权的关系更为密切。虽然埃及军队有不同程度的制度化,例如它的职业化程度很高,用人唯贤,效力于国家利益,但它仍然是世袭制的,这尤其体现在它掌控着总统的职位方面,另外它还作为埃及经济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享有特权,这也是它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的原因。

利比亚:武装力量分裂

利比亚武装力量对改革运动的反应也大不同,这是由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军政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如果说因为军队的高度制度化和对政治漠不关心,突尼斯武装力量代表阿拉伯国家的一个极端,那么利比亚可以说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在阿拉伯国家里,利比亚军队最缺乏制度化,世袭制和政治化程度最为严重。按照卡扎菲“无政府社会”的观点,利比亚整个政治体系并没有多少正常运作的政府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利比亚领导人及其家族的世袭专制统治,因而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也主要来自与卡扎菲本人关系密切的部落和家族。

尽管利比亚可以被归类为“双重军队”政权,但似乎“多重军队”政权更合适它。除了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抵御外部威胁的正规军之外,利比亚还有诸多其他军事组织,其中包括所谓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卫队和人民卫队。它们的主要目的和使命是支持和保护卡扎菲的“革命”体系和思想,而且这些组织全都由卡扎菲的亲属或由他自己的或特别忠诚于他的部落成员掌控。

即使正规军,最精锐部队也是由利比亚领导人的近亲指挥的,主要用来保护卡扎菲政权。其中最著名的是第32旅或哈米斯旅,它由卡扎菲的小儿子哈米斯指挥。据说,卡扎菲的其他儿子掌握着特种部队。

除了大规模部落或家族式的武装力量,利比亚军事组织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所谓的民兵。这位利比亚领导人创建了民兵来辅助正规军。虽然利比亚的民兵没有年龄限

制,但它的人数估计约 45000 人,而且其战斗力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卡扎菲习惯依赖外国雇佣军。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支持利比亚在非洲的军事冒险行动,这个利比亚领导人建立了伊斯兰军团,这支部队的兵源主要是贫困的萨赫勒地区的移民。

人们普遍认为,武装力量分裂和正规军边缘化致使战斗力下降,这也是这个利比亚领导人蓄谋已久的策略,他试图阻止可能会出现的任何一种危害其政权的政治力量。另外,卡扎菲故意让他的军队存在制度上(和军事上)的缺陷,同时又力图通过物质奖励来确保那些握有实权的军事指挥官的忠诚,例如,允许他们进行有利可图的军火交易,并从中渔利。

卡扎菲掌控下的利比亚武装力量可以说高度世袭制并四分五裂。最精锐的部队完全掌握在卡扎菲的部落和家族手中,毋庸置疑,他们坚决支持卡扎菲政权。此外,卡扎菲故意阻止军队发展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组织,同时又通过财政极力确保军队对其政权的依附。而当谈到军政关系时,民兵这一组织至少表明部分国家军事组织与利比亚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利比亚武装力量的这些特点也决定了他们对 2011 年初在全国各地爆发的反政府骚乱所做出的反应。一方面,当抗议运动在 2011 年 2 月开始时,部分政府军迅速投靠了反对派。据报道,卡扎菲甚至软禁了利比亚陆军司令尤尼斯将军。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成为叛军的大本营,在那里叛军制服了亲卡扎菲的军队,并将他们驱逐出城。

另一方面,与卡扎菲政权关系最为密切的精英部队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地镇压动乱。特别是上述的哈米斯旅,他们在最前线与叛军作战,尽管革命委员会也派兵去镇压抗议者。最初叛军成功地从班加西向西扩张,控制了一些城镇,但随后又被哈米斯旅打了回来。事实上,人们常常认为,如果西方没有于 2011 年 3 月 19 日开始空袭,受过更好的训练和拥有更先进装备的卡扎菲军队很有可能已经成功地平息叛乱,甚至收复班加西市。

总的来说,一方面,利比亚军队的最精锐部队的高度世袭制,以及外国武装人员与利比亚社会毫无关系,导致了他们残暴镇压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其他一些与利比亚社会有着盘根错节关系的利比亚军事组织纷纷叛变,支持反政府运动。结果军队四分五裂,支持和反对卡扎菲的部队展开了长达 6 个月之久的血腥内战。因此,尽管利比亚的骚乱就像突尼斯和埃及那样,最终推翻了这个国家的首脑,但是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突尼斯和埃及的死亡人数在数百人以内,而利比亚估计至少有 30000 人死亡,另有 50000 人受伤。

巴林: 坚决镇压改革运动

当改革运动蔓延到波斯湾国家巴林时,改革运动遭遇了巴林武装力量的另一种抵制,这也说明了巴林军政关系的特殊性。在卡姆拉瓦的类型学里,巴林被归类为“酋长君主制”政权。事实上,就像其他一些波斯湾君主国那样,巴林的武装力量不仅基于与部落的关系,而且完全由执政的哈里发家族掌控。巴林军事组织里所有最重要的职位,如国防部部长、参谋长、副参谋长、海军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都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的亲戚手中。

除了这些部落和家族的纽带,巴林武装力量还有两个独特之处:①占国家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不能参军;②非常依赖外国军队。尽管巴林人口中约2/3是什叶派,但他们在国家安全部队里的人数微乎其微。什叶派不能加入巴林军队,在其他安全机构里的人数也受到限制。据巴林人权中心统计,在巴林主要的内部安全机构国家安全局(NSA)里,什叶派的人数不到5%,而且根本无法加入准军事化的特种安全部队(SSF)。

在巴林,什叶派基本上被排斥在国家安全机构之外,与此同时,外国人大量进入这些机构。据巴林人权中心统计,逊尼派)外国人占国家安全局(NSA)总人数的3/4,而特种安全部队(SSF)里的非巴林人据说高达90%。外国安全官员主要来自叙利亚、约旦和也门。据报道他们是被招募的,并获得巴林国籍,这是为了抵消什叶派在人数上的优势。然而,巴林继续将他们视为外国雇佣军,因为他们通常不会说当地方言。

巴林武装力量和其他一些国家安全机构可以说是高度世袭制的,并脱离当地民众。尽管巴林武装力量的世袭制或缺乏制度化的程度没有利比亚那么严重,但是它也完全由执政的家族掌控。此外,与利比亚不同的是,巴林军队与社会没有真正的联系,因为它不仅排斥占国家人口多数的什叶派,而且安全机构招募大量的外国人。

这些特点也体现在巴林安全部队对待2011年2月穆巴拉克辞职后随即爆发的改革运动的态度上。在巴林,示威者主要来自占多数人口的什叶派,他们呼吁民主改革,尊重人权,并结束对什叶派的歧视。此外,就像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示威者要求推翻哈里发君主制政权。

抗议运动愈演愈烈,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随后几天,示威者封锁了整个议会大楼和麦纳麦的主要金融区。为了遏制日益动荡的局势,巴林政府要求波斯湾合作理事会

予以支援。于是,沙特阿拉伯派出约1000名士兵,阿联酋派出500名警察去镇压抗议运动。在外国军队的支援下,巴林安全部队大开杀戒,占领广场。随后,巴林军队甚至进攻并接管了收治受伤抗议者的医院。

在巴林,民众的抗议运动遭到政府军和其他安全部队的残酷镇压,而且镇压行动也得到了外国军队的支持。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巴林的军政关系和军事机构的特殊性。两个关键因素——高度世袭制和武装力量与整个社会之间缺乏联系——导致了巴林武装力量与改革运动之间的对峙以及其对抗议者的残酷镇压。

结 论

如上所述,武装力量在目前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可以认为军队对改革运动的态度和反应是这些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对经济管理不善和政治压迫的广泛不满,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成为民众的普遍运动,然而军队的作用不可小觑,它决定着统治者最终是否能被推翻。虽然驱逐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都无法被称为通常意义上的“军队政变”,因为这些反对运动既不是由军队发起也不是由军队领导的,然而在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正是由于军队对抗议者的袒护最终导致国家首脑的下台。利比亚也是如此,如果部分军队没有袒护反政府运动,反对卡扎菲政权的民众骚乱就很难成功。相反,尽管巴林、叙利亚或也门这些国家也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它们国家的统治者还能保住政权,这是因为其武装力量至少是最精锐部队的不断支持。

在解释武装力量对改革运动或反政府运动的不同反应时,本文突出了两个主要因素的重要性:军事机构的制度化或世袭制及其与整个社会关系的密切或疏远。在突尼斯和埃及,制度化程度(相对)高,突尼斯要比埃及高,而且军队与社会的关系也很密切,这就导致在对改革运动的(相对)接受方面,突尼斯军队接受的程度也要超过埃及军队。在利比亚,军队至少是最精锐部队的制度化程度很低,或世袭制程度很高,这使军队激烈反对改革运动。鉴于至少有一些利比亚的军事机构与公众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就产生了叛军和对反叛者的支持,并导致武装力量的分裂。在巴林,军队制度化程度一直很低,军队与社会的关系也不密切,因此军队残酷镇压改革运动。

然而,尽管军队已经成为推翻突尼斯和埃及(甚至利比亚)统治者的工具,但真正的民主改革,其中包括更加民主的军政关系和军队服从民主决策程序,是否能实现,仍然是

个问题。

与埃及相比,突尼斯的情况无疑要乐观些。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于传统上对政治漠不关心,突尼斯军队不会阻碍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突尼斯军队历来受到政治领导层的严格控制,即使领导层并不(非常)民主,所以军队隶属于民主选举出来的文职政府不会根本改变它在突尼斯政治体系里的作用和地位。

在埃及,鉴于军队与独裁政权的长期关系,以及军队在埃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完全有理由怀疑军队是否能真正接受民主改革。尽管埃及军方最终支持民主运动的抗议者反对总统,并在穆巴拉克辞职后致力于建立民主制度,但对它在骚乱中的行为进行悲观的(或者甚至冷嘲的)解释貌似有理:埃及武装力量只是在自己前最高统帅下台时抛弃了他,并且其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在埃及政府里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目前动荡的结局更加难以预测。叙利亚或也门等国家的反政府抗议运动有增无减,尽管政府进行了有力打击,但这些抗议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尚不清楚这些国家政权是否会垮台和何时垮台。毋庸置疑,这些国家的骚乱将继续造成血腥事件。因为它们的政权可以依靠高度世袭制的军队(和其他安全部队)的忠诚来残酷镇压民众,推翻这些国家的首脑可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即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可能最终下台或被武力罢黜,但是走向更加民主化的道路,包括形成更加民主化的军政关系,必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责任编辑:李海平)